

傳統范式的解構與重組：論張草《雲空行》中的 「新武俠」敘事策略

黃鈺程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

作為馬華新武俠小說的代表性文本，張草的《雲空行》系列並未停留在對金庸、古龍等傳統武俠經典的路徑依賴上，而是通過自覺的敘事革新，完成了對傳統武俠范式的解構與重組。本文旨在探討《雲空行》如何跨越純粹的「武」與「俠」之邊界，引入神話志怪、佛教法門及道家術數等異質性元素，從而打破傳統武俠線性與封閉的敘事成規。研究發現，張草的敘事策略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對「江湖」空間神聖性的消解與世俗歷史場域的重構；二是對古典俠客原型的現代性改寫與反英雄敘事；三是文體邊緣的消融與跨文類（Cross-genre）雜糅。透過這些敘事策略的分析，本文進一步指出，《雲空行》不僅展現了張草個人對武俠小說文體的美學突圍，更深層地折射出現代語境下馬華文學對於文化身份、歷史記憶與現代性焦慮的獨特回應，為當代華文新武俠小說的精神流變提供了重要的觀察樣本。

關鍵字：張草、《雲空行》、新武俠、敘事策略、跨文類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Paradigms:
On the “New Wuxia”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Zhang Cao's *Yun Kong Xing***

*Huang Yuc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text of Mahua (Malaysian Chinese) "New Wuxia" fiction, Zhang Cao's *Yun Kong Xing* series does not confine itself to the path dependency on traditional wuxia classics by authors such as Jin Yong and Gu Long. Instead, through conscious narrative innovation, it accomplishe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wuxia paradigm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Yun Kong Xing*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pure "wu" (martial arts) and "xia" (chivalry) by incorporating heterogeneous elements such as myths and the supernatural (*zhiguai*), Buddhist practices, and Daoist esoteric arts (*shushu*), thereby breaking the linear and closed narrative conventions of traditional wuxia.

The study finds that Zhang Cao's narrative strategies are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desacralization of the *jianghu* spa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secular historical field; second, the modern rewriting of classical chivalric archetyp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hero narratives; and third, the dissolution of stylistic margins and cross-genre hybridiz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narrative strategies, this paper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Yun Kong Xing* not only demonstrates Zhang Cao's personal aesthetic breakthrough within the wuxia genre, but also profoundly reflects Mahua literature's unique response to cultural identity, historical memory, and anxieties of modernity within a modern context. Consequently, it serves as a crucial case study for ob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thos in contemporary Sinophone New Wuxia fiction.

Keywords: Zhang Cao; *Yun Kong Xing*; New Wuxia; Narrative Strategies; Cross-genre

引言

武俠小說的敘事空間，向來帶有一種奇特的地理自足性。無論故事發生在宋代汴梁還是明末武林，無論作者身處高廟抑或市井街巷，「江湖」這個想像共同體總能以一種超地域的方式運轉。它既是武俠文類的核心裝置，也是一道隱形的中心化引力，悄然將受眾的目光引向同一套「中原正統」的座標體系。然而，這種想像性的地理統一並非價值中立。當它進入學術場域後，便常常化作一種隱蔽的前提，固化了研究視閥。

檢視既有的武俠小說研究，這種「中心化」傾向尤其明顯。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中以古典遊俠精神與文人想像的糾纏為縱深，構建了武俠類型學；葉洪生與林保淳在《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則以臺灣出版場域為座標，提供了另一條具有地域意識的文學史敘述。這兩條路徑各見所長，但其視野基本未曾離開「內地——港臺」這一主軸。在這一宏觀格局下，新馬等東南亞華文地區的武俠創作，往往僅被視為傳播鏈條尾部的「接受現象」，而非具有獨立座標的「生產場域」。

與此同時，在馬華文學研究內部，又存在著另一重結構性的遮蔽。當黃錦樹、張錦忠等學者在敏銳辨析馬華文學的「中國性」與「本土性」張力時，其論述的核心始終聚焦于純文學場域。而通俗文類，尤其是帶有強烈中原文化符號的武俠小說則在這一討論視野中近乎缺席。由此，馬華武俠創作便從這兩大領域的縫隙中悄然滑落：它既難以躋身主流武俠研究的版圖，又難以被納入馬華文學批評的主要關懷。

正是在這一「雙重邊緣化」的學術背景下，張草的《雲空行》展現出了極高的對話價值。作為馬華新武俠創作中敘事高度自覺的文本，《雲空行》並未順從于既有的武俠慣性軌道。相反，它通過對「江湖」空間、俠客原型與敘事文體的多維改造，探索出了一套有別于固有傳統的敘事策略。需要廓清的是，本文所指的「解構與重組」，並非一種割斷傳統的浪漫化決裂。張草敘事革新的真正意義，恰恰在於他始終身處與傳統的巨大張力之中，在承認傳統規約的前提下，從內部撬開了一個異質性的敘事空間。

基於此，本文將借助敘事學與文化批評的雙重視角，從三個互為支撐的維度展開論述：其一，《雲空行》如何剝離傳統「江湖」的浪漫與神聖性，將其重新錨定於世俗的具體歷史場域；其二，文本在人物塑造上如何對古典俠客原型進行現代性審視，進而生成反英雄敘事的內在機制；其三，異質性元素（如神話志怪、佛教法門、道家術數）的引入如何打破武俠文類的固有邊界，產生跨文類（cross-genre）的雜糅美學。三個維度的交融最終將匯向一個共同的文化命題：《雲空行》的敘事選擇，如何折射出現代語境下馬華文學應對文化身份、歷史記憶與現代性焦慮的特有姿態，以及它為當代華文新武俠精神流變所提供的獨特座標。

一、「江湖」空間的祛魅與歷史場域的重構

「江湖」在武俠小說的詞彙系統中，向來是一個高度超載的空間符號。它既是具體的地理指涉：某個廟，某片湖，某座山……又是超

越具體地理的意識形態裝置：一個與朝廷（主流）相對、擁有自身秩序與道德的異質空間。陳平原在分析武俠文類的空間邏輯時，將「江湖」描述為一個「化外之境」，一個俠客活動的背景，一個懸浮於正史時間之外的道德自足領域，其存在的正當性恰恰建立在對官方主流世界的拒斥與超越之上。¹ 這一判斷相當精準，但它同時也揭示了「江湖」作為敘事空間的某種根本性張力：越是強調其化外性與神聖性，它與真實歷史的距離便越遠，最終淪為一個美學上令人著迷、卻在現實層面高度封閉的烏托邦。

金庸與古龍的武俠敘事，各自以精緻的方式處理了這一張力。金庸的《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等長篇，一面以宋、遼、金、元的宏大歷史為底色，一面又將江湖的核心運作邏輯：武功傳承、門派恩怨、俠義信約等維持在相對獨立的自律秩序內。歷史在金庸筆下更多充當蒼涼的舞臺佈景，郭靖死守襄陽，根本上是受「俠之大者」的江湖倫理驅動，而非受制于歷史的必然規律。古龍則走向了另一極，他以徹底去歷史化的方式，索性剝離了具體的朝代背景，將江湖推向純粹的心理與存在主義空間。兩者的處理殊途同歸，其敘事功能都依賴於「江湖」與現實世俗世界之間某種程度的隔離，但正是這道隔離，保證了俠客行動的神聖意涵與超越性的價值。正如陳大為在考察武學敘事中的「少林譜系」時所指出的，諸如少林等武學重鎮，已然在漫長的文本流變中被建構成一套「天下武宗」的超級空間符號與正統信

¹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頁145-148。

仰。²

張草的《雲空行》對這一傳統前提的挑戰，首先發生在空間層面。與傳統武俠將衝突安置于峨嵋、武當或大漠等充滿神話積澱的地理符號不同，張草將敘事直接砸向了極其具體、甚至帶有濃厚文獻考據色彩的「正史空間」。整部小說的敘事時間跨度極大，從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一直延伸到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都是以嚴格準確的歷史考據為敘事空間展開的。

在《雲空行》中，虛無縹緲的武林大會被真實的歷史事件所取代。例如，在《雲空行》（二）之廿五〈曇華投爐〉一篇中，小說將時間線置於宋宣和七年至靖康元年（1125-1126年），金人南下圍攻太原府，雲空困於城中，窮苦的「孝子」發現自己擁有隔空取物的特異功能，為報答知府張孝純，他隔空盜取金兵的糧食與兵器來支援守城。這正是以「靖康之變」為歷史事實。同時，小說文本中對城樓、糧草、街道、天氣等等也進行了近乎博物學般的細節還原。³當「江湖」的發生場所從武林聖地轉向可以在史料中逐一核實的世俗地名與歷史現場時，敘事空間的性質便發生了根本改變。前者的神聖性來自文化記憶的長期積累，攜帶著一套關於修煉與行俠的意義系統；而後者則是歷史事件真實碾壓的場所，殘留著世俗權力運作與末世政治的血腥氣。當主角雲空現身于這種空間時，他所面對的便不再是可以被「俠義」

² 陳大為：〈天下武宗：武學敘事視野下的少林譜系（622-2018）〉，《文與哲》，2023年6月，第42期，頁317-343。

³ 張草：《雲空行》（二），臺北：皇冠出版公司，2019年版，之廿五〈曇華投爐〉。

規則完整消化的武林恩怨，而是一個擁有自身殘酷邏輯、不服從任何浪漫敘事規律的歷史深淵。

借助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的「時空體」(Chronotope) 概念，能更深刻地揭示這一轉變。⁴ 巴赫金指出，時空關係承載著特定世界觀的形式結構，不同的時空體構型，對應著不同的人物行動可能性與敘事價值判斷。⁵ 傳統武俠的「江湖」接近于「冒險時空體」：空間轉換服務于俠客的奇遇，而歷史時間的流逝無法改變人物的本質。《雲空行》則呈現出另一種構型：歷史時間的重壓滲透進了空間的肌理。

在處理「靖康之變」這一核心歷史事件時，張草並沒有將其處理為俠客展現武功的背景板，而是將其化作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劫難。雲空的方術與武功在宏大的歷史災難與末世荒謬面前，顯得極度邊緣與無力。歷史事件以內在的破壞力，直接擊碎了傳統武俠「人定勝天」或「邪不壓正」的敘事閉環。

這一時空體的轉變，潛藏著馬華文學特有的文化政治意涵。作為身處南洋的離散者，張草對於「中原」的想像，並未採取傳統武俠那種「文化原鄉」的浪漫化認同。相反，他筆下的宋代中原，是一個充滿危機、異化與末世焦慮的危邦。這種空間處理，與馬華群體的歷史經驗形成了深層共振。馬來西亞華人的集體記憶，本質上是在流離與邊緣中確立自我的記憶。這種處境使得「中心/中原」在馬華作家的

⁴ Mikhail Bakhtin, "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84-258.

⁵ 米哈伊爾·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頁274-275。

筆下，往往不再是神聖的道德棲居地，而是需要被審視、被解構的異質對象。

黃錦樹在討論馬華文學的「在地性」時曾指出，馬華文學面臨的核心困境在於既無法徹底擁抱中國傳統給予的象徵資本，又必須在本土尋找敘事的合法性。⁶《雲空行》對中原歷史空間的「去神聖化」，恰是對此困境的絕佳回應。張草不是通過書寫南洋風物來標舉本土性，而是通過將「中原江湖」還原為充滿創傷的世俗歷史現場，從而剝離了中原文化的話語霸權。他讓武俠敘事承載了離散者對「中心」的幻滅與疏離，使「江湖」重新獲得了歷史的粗糲感。

這種敘事革新，既解除了武俠文類封閉的烏托邦外殼，也為馬華文學借用通俗文類處理宏大歷史記憶提供了一條極具張力的突圍之徑。

二、古典俠客原型的現代性改寫與反英雄敘事

古典的「俠」在起源之初，就並非一個完美無瑕的道德共同體。這是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為遊俠立傳時，其筆下的人物大多游走於律法邊緣，以私義凌駕於公法。司馬遷對此並非全無保留，他的敘述中潛藏著一種難以消解的矛盾。這種矛盾既讚賞遊俠的重諾輕死，又深知這種義氣所依賴的是一套與正統秩序相悖的暴力邏輯。⁷ 儒家「俠以武犯禁」的經典定性，更是直接

⁶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2012年版，頁52-86。

⁷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第六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650-680。

將其界定為制度的破壞者。換言之，「俠」這一原型自誕生起便攜帶著道德裂縫，其神聖的光暈更多是後世敘事傳統層層疊加的產物，而非天然給定。

現代武俠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這一「神聖化」的加工工程。如金庸筆下的大俠，郭靖的厚重、蕭峰的悲壯、張無忌的寬恕等，無一例外經歷了一套嚴密的道德磨礪，最終在個體命運與民族大義間達成了崇高的和解。陳平原將這一傳統精準概括為「遊俠精神」與「文人理想」的歷史合謀，即武俠小說的俠客原型，是文人將儒家道德理想投射于遊俠之身的敘事產物，其內在矛盾不是被直面，而是被一種關於「大義」的敘事邏輯所暫時彌合。⁸古龍的剝離則更為激進，他將俠客從具體的家國使命中抽離，推向虛無與孤獨。但吊詭的是，古龍的俠客在卸下道德重負後，反而以一種極致的個人主義重新建立起另一種英雄光暈。兩者的敘事表像迥異，卻共用著英雄敘事的底層結構。正是在這一向度上，《雲空行》對俠客原型的改寫，展現出強烈的異質性與解構意味。

小說的主角「雲空」被設定為一個非典型的「半道士」。他沒有顯赫的師門，沒有背負傳統的血海深仇，甚至沒有完整的個體記憶。雲空在江湖的遊走，其核心驅動力不再是傳統的「行俠仗義」或「快意恩仇」，而是為了解開自身的內省之謎。這種近乎存在主義式的「尋找自我」，從根本上偏離了古典俠客以「義」為核心的行動邏輯。

借用阿爾吉爾達斯·朱利安·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⁸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頁15-19。

Greimas) 的「行動元模型」(Actantial Model) 來透視, 傳統俠客通常以「正義的實現」作為明確的追求對象 (Object), 這賦予了英雄行動以絕對的道德正當性。⁹而《雲空行》對這一結構的擾動, 則表現為主體 (Subject) 與物件之間關係的根本性崩塌。

不論是雲空命中註定的火劫降臨、被妖火燒成焦炭, 還是在凌家莊院裡中了凌老爺難解的邪惡蠱咒, 再或是與赤成子誤入秀水澗與世隔絕, 找不到出世的入口, 以及在百妖堂被群妖活生生剝去皮肉……雲空所代表的個體武力 (與方術) 顯得極其微不足道。他一再發現, 無論是武俠的刀劍還是道家的法門, 都無法拯救那個正在加速朽壞的時代。面對歷史的絕對碾壓, 俠客的行動不僅無法伸張正義, 甚至連「自證清白」都顯得荒謬。與其說他是故事線的參與者 (主角), 不如說更像一個平凡的旁觀者。

這便觸及了盧卡奇 (Georg Lukács) 在《小說理論》中所命名的「有問題的個體」(problematic individual)。¹⁰如果說傳統俠客與「江湖秩序」是和諧共生的, 那麼雲空則是徹底的異鄉人。他生活在一個無法用完整俠義倫理去度量的歷史廢墟中, 他的「俠」與「道」的身份與他真實的生存處境之間, 橫亙著一道無法彌合的裂縫。

這種敘事裂縫並非僅僅停留在人物性格的缺陷層面, 它更深層地指涉了馬華文化身份的特殊語境。馬來西亞華人長期身處一種雙重邊

⁹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Structural Semantics: An Attempt at a Method*, trans. Daniele McDowell, Ronald Schleifer, and Alan Veli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pp. 197-221.

¹⁰ Georg Luká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 pp. 60-99.

緣化的結構之中，既外在于馬來西亞國族敘事的核心，又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原鄉」保持著難以逾越的距離。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將這種處於文化夾縫中的生存狀態命名為「第三空間」(Third Space)。

11

雖然《雲空行》的背景設定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前期，但張草卻將馬華主體的焦慮，巧妙地移植到了人物的生命體驗中。雲空手持中華傳統的武俠與道家語法，面對的卻是一個異化的、不可理喻的「中原廢墟」。他試圖以一種抽離的姿態旁觀，卻不可避免地被荒謬的歷史捲入其中。這種身處「中心」卻深感「邊緣」且不斷在失憶與追尋中協商自我定位的狀態，恰恰是馬華離散群體「第三空間」處境的絕佳隱喻。反英雄敘事在此不再是單純的技法炫耀，而成為一種形式上的歷史表白。當文化身份本身處於流動的協商狀態時，英雄的絕對確定性自然便成了一種奢侈。

必須強調，《雲空行》的反英雄敘事並未墮入虛無主義。面對道德的模糊與個體的無力，張草依然保留了敘事的嚴肅性與痛感。這種承認世界之複雜，卻不以複雜為由取消追問的態度，賦予了當代馬華新武俠一種極具現代主義精神的美學質地。

三、文體邊界的消融：跨文類敘事策略與雜糅美學

文類從來都不只是一種中性的分類工具。當我們界定某部小說「是」武俠小說時，調動的並不僅僅是一套形式標準，而是一整套關

¹¹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36-39.

於敘事期待、閱讀契約與文化歸屬的隱性共識。阿拉斯泰爾·福勒（Alastair Fowler）將文類界定為一種「可辨識的慣例庫存」（identifiable repertoire of conventions），強調文類的運作本質上是作者與讀者在歷史中達成的協議關係。¹²這意味著文類邊界的維護與打破本質上都是一種文化行為，是對既定閱讀契約的有意識的修訂。

在武俠小說的現代演變中，神怪與奇幻元素並不陌生，從還珠樓主（李壽民）的《蜀山劍俠傳》到黃易的《尋秦記》，異質元素始終存在。但在這些傳統文本中，異質元素的引入通常服從於清晰的功能邏輯，即神怪往往是武功奇遇的來源，或為俠客賦予超凡力量的敘事工具。它們以「服務者」的姿態進入，其背後的世界觀並不對武俠的核心價值體系構成實質性干擾。借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概念，這是一種「獨語性」（monologic）的文類整合，即異質話語被強行收編進武俠的主導體系，而未能形成真正的對話張力。¹³

然而，《雲空行》對奇幻志怪與道家術數的引入，展現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敘事邏輯。在《雲空行》中，張草以《山海經》、《太平廣記》、《抱樸子》、《周易》、《楞嚴經》等佛家經典、道家典籍、神話、志怪小說、上古筮哲學元典等為嚴格而具體的考據，志怪元素的介入不再是單純的氣氛點染或力量升級，而是直接衝擊了武俠敘事的本體論。

¹² 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p. 74.

¹³ Mikhail Bakhtin: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259-422.

中國古典志怪（如幹寶《搜神記》或蒲松齡《聊齋志異》）的核心張力，在於人與異類（鬼妖神）邊界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性深刻挑戰了人作為道德主體的確定性。《雲空行》承繼了這一傳統基因，雲空所面對的敵人往往不是傳統武林中門派傾軋的惡人，而是源自非人力量（如怨靈、妖祟或失控的方術機器）。當這些不受江湖道義約束、超脫於人間善惡二元對立的異類力量介入時，傳統武俠中「懲惡揚善」的清晰線性邏輯便被徹底瓦解了。異類的存在，構成了一套對於主體邊界和世界秩序的根本質疑，恰好與前文所述反英雄敘事的現代性改寫形成了共振。

其次，佛教與超自然倫理的介入，深刻擾動了武俠敘事的核心結構：傳統武俠高度依賴線性的因果邏輯（恩必報，仇必償）。但在《雲空行》中，這種基於個人意志的復仇與守護常常被置於更為宏大、甚至令人絕望的「業力」或宇宙迴圈法則之下。雲空的許多行動表面上是實體層面的武力對抗，深層卻是試圖化解跨越生死的執念與業障。當「我」的意志在因果律面前顯得微不足道，甚至「我」本身就是有待破除的執念時，俠客以自我為軸心展開的行動，其形而上學的基礎便發生了動搖。

同樣，道家術數在《雲空行》中也構成了對敘事結構的重要張力。在傳統文化語境中，蔔筮、五行等術數是一套映射宇宙秩序與人事吉凶的系統。當張草將繁複的道術推理引入小說，它帶來的絕不僅僅是「鬥法」的視覺奇觀，而是引入了一種與「英雄意志論」相悖的宿命感。在傳統武俠中，「算無不如天意」通常只是為了烘托英雄抉擇的

悲壯，但在張草的《雲空行》中，吉凶的推演往往具備冰冷的必然性。借助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的「預敘」（prolepsis）概念來看，當術數構成敘事中的時間預示，它不僅是情節技巧上的「伏線」，更在深層追問：如果命運的軌跡已然可以通過術數測算，那麼俠客所謂的自由意志，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是自由的？¹⁴

將這三類元素的引入方式合併審視，我們可以辨認出《雲空行》獨特的敘事取向。張草並非以「採樣」的方式將異質材料拼貼進武俠框架，而是讓志怪、道術等異質話語系統，以其自身的內在邏輯進入文本，與武俠預設形成了真實的抗衡。這正是巴赫金「雜語性」（heteroglossia）的實質。不同的話語系統在文本中並置，各自攜帶其價值取向，而非被單一聲音收編。¹⁵《雲空行》的跨文類敘事，實質上是在相對封閉的武俠文類內部，啟動了充分的「小說性」（novelness）。

這種文類雜糅背後的文化動力，與馬華社會的現實語境存在著深刻的同構。馬來西亞華人的日常文化經驗，本身就是多個話語系統並置的產物。華人宗教傳統（儒釋道混融）、馬來伊斯蘭文化、英殖民制度以及全球化網路，在馬華社會以非系統、非層級的方式共存。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草的跨文類實踐並非是對西方後現代美學的刻意移植，而是一種對其所處文化現實的形式忠誠。以雜語性的敘事結構回

¹⁴ 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67-79.

¹⁵ Mikhail Bakhtin: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263-265

應雜語性的馬華語境，也成為一種內在的必然。

這也使《雲空行》與那種為混雜而混雜的後現代拼貼趣味嚴格區分開來。後者以能指遊戲為目的，而前者以混雜為手段，指向的是關於身份、歷史與文化歸屬的嚴肅命題。正如張錦忠在分析馬華文學的「南洋想像」時所言，馬華書寫對「異質性」的處理，往往不是對他者的獵奇凝視，而是對自身文化混血現實的內部書寫。¹⁶《雲空行》通過消融文類邊界，將「中原」武俠框架與雜糅的異質元素相互改造。這不僅是美學層面的敘事擴容，更是在通俗文學場域內完成了一次馬華文化主體性的形式聲張。

結語：馬華文學的精神座標與新武俠的文化政治

本文所分析的三個敘事維度，若單獨抽離來看，似乎指向不同層面的文學技術問題。空間的歷史化關乎敘事佈景，俠客原型的改寫關乎人物，文類邊界的消融關乎體裁。然而，當我們將這三個維度置於同一闡釋框架下時，一個更為統合、完整的敘事意圖便清晰浮現：《雲空行》在每一個層面上都在將武俠文類原本自足、封閉的內部秩序，強行向外部的複雜性敞開，向歷史的沉重、身份的焦慮以及多元話語的雜糅敞開。這種一以貫之的「敞開」姿態，絕非孤立的寫作炫技，而是源自同一種深層的文化處境壓力。

這裡潛藏著一個極具張力的文學悖論。張草藉以表達馬華文化經驗的媒介，恰恰是一個源自中原、港臺中心、攜帶著強烈「中華正統」

¹⁶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版，頁77-94。

記憶的通俗文類。武俠的經典敘事語法諸如江湖、門派、大義等等，本身就是一套隱含著地理與道德中心主義的符號系統，它與馬華群體所處的邊緣離散位置存在著結構性的抵觸。然而，張草並未回避這套龐大的語法，而是選擇潛入其內部進行重新部署。這一選擇本身便已構成一種鮮明的文化政治姿態。他沒有通過「拒斥中心」來宣示邊緣的自主，而是通過「改寫中心」，從而在舊有的文類廢墟上為邊緣經驗開闢出新的敘事空間。這與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論述的殖民話語中的「模擬」（Mimicry）機制遙相呼應，卻更具主動性和顛覆性。它不只是在中心話語上留下邊緣的痕跡，而是試圖將這一話語轉化為承載本土歷史記憶與文化現實的容器。¹⁷

由此觀之，《雲空行》對華文武俠批評史的真正貢獻，並不在於它為既有的武俠譜系增添了一個海外獵奇案例，而在於它的存在本身對這一譜系構成了嚴厲的提問。我們習以為常的那套武俠理論框架，是否早已將「港臺中心」的前提內化為了普遍標準，從而在結構上導致了馬華武俠創作的「不可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對《雲空行》敘事策略的深探，便不再只是一次個案的細讀，而是對武俠研究方法論的一次深刻反思。

誠然，受制於會議報告的篇幅，本文的分析仍有其局限。三個維度的討論目前多停留在框架性建構，文本細讀的密度尚待在未來的博士論文中進一步夯實；此外，《雲空行》在臺灣皇冠出版社的生產機

¹⁷ 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85-92.

制、讀者的跨域接受史，也是值得獨立深挖的議題。更具潛力的延伸方向，是將張草與同為大馬出身、卻在臺灣文壇大放異彩的溫瑞安（如《四大名捕》系列）進行對照。溫瑞安選擇了一條「全面融入中原武俠正統」的經典化路徑，而張草則走向了文體內部的解構與異化。將這兩位馬華作家的「同源殊途」置於同一參照系下，或許能更精準地照亮張草敘事革新的特殊動力。

張錦忠在剖析馬華文學的文化屬性時，曾以「離散」與「本土」的雙重張力作為核心座標。¹⁸本文的分析印證了這一座標的有效性，同時也提示我們在通俗文類的場域中，這種張力有著截然不同的突圍路徑。武俠文類的大眾性與流通性，使得張草的敘事實踐能夠越出純文學的狹小圈層，進入更廣泛的閱讀共同體。陳大為在探討當代武俠的流變時曾敏銳地指出，21世紀的華文武俠小說已然面臨文類內部的「絕境」，創作者必須在敘事文體與精神內核上蹣出一條「險徑」。¹⁹若以此觀之，張草這種跨域流通本身，就是馬華文學聲張自身主體性的一種「險徑」策略——它不必在學院的嚴肅話語中角力，而是直接在普通讀者的閱讀快感中，悄然植入一種帶有南洋視閥與離散焦慮的異質回聲。

劍走偏鋒者，未必離經叛道。《雲空行》的敘事策略之所以值得我們鄭重對待，正是因為它的「新」並非以虛無的解構為終點，而是以更誠實地回應馬華現實處境為動力。這或許也是我們在觀察當代華

¹⁸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版，頁43-59。

¹⁹ 陳大為：〈21世紀臺灣武俠小說的絕境與險徑——以沈默武俠為例〉，《長江學術》，2021年第2期，總第70期，頁17-23。

文新武俠精神流變時，一個比「技巧是否創新」更具切膚之痛的追問。作家究竟是在哪種文化壓力之下，以何種越界的敘事方式，在為誰的歷史經驗發聲。

參考文獻

- [1]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 年版。
- [2]陳大為：〈天下武宗：武學敘事視野下的少林譜系（622-2018）〉，《文與哲》，2023 年 6 月，第 42 期，頁 317-343。
- [3]張草：《雲空行》（二），臺北：皇冠出版公司，2019 年版，之廿五〈曇華投爐〉。
- [4]Mikhail Bakhtin, "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84-258.
- [5]米哈伊爾·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頁 274-275。

- [6]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2012年版，頁52-86。
- [7]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第六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650-680。
- [8]Algirdas Julien Greimas: *Structural Semantics: An Attempt at a Method*, trans. Daniele McDowell, Ronald Schleifer, and Alan Veli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pp. 197-221.
- [9]Georg Luká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 pp. 60-99.
- [10]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36-39.
- [11]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p. 74.
- [12]Mikhail Bakhtin: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13]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67-79.
- [14]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版，頁77-94。

[15]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85-92.

[16]陳大為：〈21 世紀臺灣武俠小說的絕境與險徑——以沈默武俠為例〉，《長江學術》，2021 年第 2 期，總第 70 期，頁 17-23。